导　言

研究陈亮及其与朱熹的论辩对于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必要的。朱熹(1130—1200)将中国的人文传统综合为新儒学，使之成为直至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与官方的正统思想。陈亮（1143—1194)则代表功利主义的思潮,被 12 世纪新儒家的伦理学与形而上学所埋没，直到大部分中国人赞同功利主义取向并且指摘新儒学的 20 世纪,他才声名鹊起。同朱熹哲学相比,陈亮思想的内容比较接近现代西方与中国的观念，因此可以为探讨有创意的思想及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段关键时期提供一个较为切近的基础，这是本书把陈亮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朱熹与陈亮这两位 12 世纪的学者的确象征着中国思想内部两种占主导地位的流派:我们可以用‘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在这里,事功是指积极的事功而不是指消极的结果）来概括二者的特征。[①]他们论辩的焦点在：一方强调动机，一方强调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他们 1182—1186 年间的通信中窥测出来（随后一直到 1193 年,两人的交流比较有限)。他们讨论的问题并不新颖,但他们的论辩却是中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最深入、最持久的论辩之一。本书通过研究儒学内部两种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立倾向之间的尖锐冲突，以求使情况更加明晰。事实上，儒学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因为儒学既重视个人德性的修养，又强调社会与政治功效的重要性。儒者之间意见不一造成两者之间平衡的困难，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根本上是细微的，体现在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这些差别本身对于理解中国思想很有意义，不过人们没有必要视这些差别为截然的分离与对立，而 20 世纪却偶尔有人阐述过这样不当的看法。

陈亮与朱熹生活在一个民族与文化出现危机的时代。经学研究在 11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中曾一度复兴，然而，能够重新恢复经典所昭示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乐观主义在 12 世纪初却动摇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设计都不能解决国政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企图通过思想的一致来达到民族的共同目标。文字狱与派系斗争加速了国家的衰亡，直至 12 世纪 20 年代中期，北宋王朝（960—1127）终于被来自满洲的金人所灭。朝廷在 1127 年重建南宋，但它还是失去了北部中国及其在 11 世纪所有的民族与文化的自信。在这场浩劫的余波中，文化建设使许多学者转向注重道德修养和教育，以期从在 11 世纪的文化复兴运动中重新发现的儒家价值观中找出自信的基础。在文化建设中，学者之间形成了宽容的精神。但是伴随着北部中国的沦丧，国家的政治问题、经济困难仍然引起一些根本问题，引发了对于价值观念和朝廷政策的不同看法。

在努力寻找更系统、更明了地解决问题的方法中，陈亮与朱熹各自对 12 世纪中叶学术界的纷杂局面进行了抨击。他们在一些特殊的政治问题上有很多的一致。例如，两者都认为必须发动抗金战争以收复失土；然而，即使是意见一致的问题，仍然显示出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朱熹与陈亮的主张并不完全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吻合，但是他们的身世又确实影响到各自的思想。朱熹的父亲是一位士大夫，

因反对南宋朝廷的求和政策而罢官在家。他培养了朱熹对北宋儒家哲学的兴趣，不过朱熹还出入于释老之间；尽管如此，当朱熹认同儒家传统之后，就逐渐创造出一套综合体系，为那些他认为与别的传统具有可以接受的相类之处划定了界限。朝廷给了几年的闲职使朱熹能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哲学体系的创建中。朱熹早年科举及第，但是他的伦理主张与道德标准却让朝廷在授职问题上颇为踌躇。他与大臣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他晚年被列入党禁名单。不过，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受到了朱熹哲学的魅力并且自愿为之献身，最终朝廷也将它树立为正统思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朱熹终其一生在社会上与朝廷中享有比陈亮高的地位，但总的说来他对朝廷的批评更具乌托邦色彩和理想味道；而陈亮则希望回到开国君主的统治模式。

陈亮直到晚年才谋到一官半职,这对他是个打击,或许也正因此才促使他对当时儒家的价值与规范提出挑战。陈亮年轻时由其祖父传授学业，他的祖父在科举文试与武试中屡遭挫折，终日酗酒，家道因此败落。陈亮曾任一位达官的私人秘书，并娶了当地一位世家小姐为妻，但家庭的厄运并没有因此而扭转，相反更加一落千丈。陈亮的父亲因被指控唆使谋杀而下狱，母亲和祖父母都相继亡故，后来陈亮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太学生，研究宋代的伦理学与形而上学。

在这个以朱熹体系为主流的儒家哲学时期内，陈亮用自己微薄的钱财印了几部儒家哲学书，而没有为母亲和祖父母送终尽孝，这显示了他特立独行的本性。跻身官场的抱负激励着他再度参加科举,并且上书皇帝.然而,科场上的接连失败,自以为有做官的天赋却没能做成官的命运,一切都使得陈亮更加‘ 激进 ”;一方面这表现为他对早期儒家的回归，他的学说比同时代的儒学更加实用化；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他的行为和观念在同时代的许多儒者看来是不可思议、片面激进的。尽管陈亮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自豪，但

他还是不得不为他的思想所经常遭到的抵制以及生活方式和性格所引来的一身官司感到苦恼。他曾三度下狱，一次因欺君罪，两次因谋杀罪。尽管事实上他总是幸免于罪，但指控所带来的麻烦和牢狱生涯打断他参加科举，求取功名。51 岁时，陈亮终于及进士第，而且荣登榜首，授佥书建康府判官公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官职。而在去建康赴任途中，陈亮染病而死，此时他一定体会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挫折感。

陈亮与朱熹的论辩包含了一些适于跨文化比较的素材，但我们应当注意不去使用西方的参照物，否则将会妨碍对中国特定背景之下的问题的理解。一方面，基本的价值问题也是现代西方所关注的问题。例如，价值与真理是普遍的还是相对于特定种族文化或特定时间点上的个人呢？相对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统治术，理想主义方案是如何可行的？尤其在人们把注意力从较实际的政府功能上移开时，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人伦理观念在政治中到底轻重如何？在追求物质福利与制定具体政策的过程中，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程度的个人或社会行为准则的影响呢？另一方面，正如下文评述运用特定西方术语来讨论中国思想时所表明的那样，非西方社会的观念并不总是符合于西方人的想象；因此，西方的观点不能用来判断或歪曲我们对问题的讨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所运用的特定的中国历史背景造成了对陈亮与朱熹之论辩的不同程度的曲解。学者们将其它儒家学派的分析模式与形而上学定义用于研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这些范畴确实有助于理解该论辩；而且，在历史上，朱熹和他在北宋的导师之间或和儒家哲学内部主要对手之间的关系被认为超过了他与陈亮的交往。但是研究该论辩还是必须回到它本身所处的背景中；这就要求对陈亮有更多的了解。通过分析陈亮思想的范畴与定义，以及挑起论辩的一些文章，我们能够加深对朱熹思想和该论辩自身的理解。不过，首先有必要弄清楚历史上对陈亮的看法。

众家眼中之陈亮

当学者们试图将陈亮置于诸多思想流派的背景中时，产生了重要的解释性问题。说到底，学者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对陈亮思想的“内容”与“成因”存在根本分歧。因此，评判这一争论首先就要了解陈亮的政治主张和著述的内容是什么。另外，审视不同学者将陈亮置于特定传统或现代的“主义”的标题下的思路为我们对中国政治文化研讨的分析模式的反思提供了基础。从宋至今的历史学考察也提示了对陈亮思想的看法逐渐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这些相似的看法跨越了意识形态、文化及时代的分歧。学者基本上赞同陈亮是功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且，他还是一位关注现实问题、对影响现实状况的历史变迁或历史情势敏感的活动家（日本和西方的学术界赞成这些判断[②]）。强调不同、议论各异并不能掩盖惊人的一致：尽管唯物主义作为正面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密切关联，但在台湾吴春山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仍然称赞陈亮是唯物主义者。

在运用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西方概念之前，有必要对它们加以界定。首先，功利主义指的是对效果的关注——即事功伦理。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功利主义是陈亮思想的主要特征；不过通常功利主义似乎只意味着走入现实或关注社会政治结果。其实，功利主义者的涵义更广，陈亮即便在更广、更严密的意义上也是功利主义者。例如，《哲学百科全书》将“功利主义”定义为“认为行为的对错由结果的好坏决定的一种学说”[③]。不同的看法，如判定愉悦和高兴是对每个人而言还是只属于自己一人的，可以将功利主义划分为各种类型。但所有功利主义者都将效果看作评价善或适当的基础。在汉语中，功利主义(功利)首先强调两个相关目标：达到具体的结果、后果(功)；增大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利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处(利)。

其次，称陈亮为民族主义者有一些问题。在德意志和浪漫主义的民族共同体和祖国的概念的意义上，他的思想是民族主义的。④另外一些人称他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则基于在面临外来侵略时他对朝廷发自内心的忠诚；但民族主义远远超出了敌视外族、文化沙文及努力巩固王朝统治以反抗外族侵略的范畴。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概念，尤其是经过英美的发展，并不适合用于陈亮的讨论。不过，与陈亮观念相容的民族共同体和祖国概念的浪漫主义及德意志特征也暗示民族主义并不必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化及现代化之类的思想。

最后，唯物主义者一词容易使人误解。中国学者称赞陈亮为唯物主义者,表示的是"旧式"(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指将功利作为判断标准，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资料、实际状况以及个人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以积极入世姿态出现的功利主义者。⑤如果使用西方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会产生问题。例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就没有“物质”分解成原子这种化约主义概念。⑥

陈亮同时代学者努力寻找他的先驱预示了后来意见的分歧（与西方学术相比，传统的中国史学比较强调由师承、地域及文献传统建立起的学术谱系以及由此作出的解释）。朱熹认为，陈亮对历史演进与现实结果的爱好，显示了他与汉代史家司马迁（前145—前90）及传统的功利主义代表相一致的地方。⑦王淮(1126—1189)认为陈亮继承了苏洵(1009—1066)父子的文学与史学观,而叶适(1150—1223)却认为陈亮与其他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在为陈亮文集所作的序中写道，陈亮恢复了已经中断数百年的思想。陈亮的经世理论抓住了统治者处理实际问题所运用的治术之精微；而且，陈亮发现的那些朴素的道理，宋朝的几代学者都没能理会。⑧

《宋史》引入了一些概念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它将朱熹以及

与之密切相关的思想家纳入到“道学”范畴下，即他们特别有志于复兴并传承古代的儒学真理。陈亮则被列进宽泛的“儒林”传；因此,陈亮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宋代的儒家哲学家,却不在具有‘道学”特殊身份的学者之列。在朱熹的时代，因为他们一圈人声称要恢复传承若干个晦暗世纪以来被湮没的古圣先贤的思想，所以朱熹的反对者将‘道学’等同于颠覆朝廷的‘伪学”。虽然《宋史》用‘道学”来表彰朱熹及有关思想家，而中国这一时期的第一部断代学术史《宋元学案》却批评了‘道学’一词的随意和武断。⑨

《宋元学案》的编纂者对陈亮的学术渊源也无一致的看法。全祖望(1705—1755)认为陈亮没有师承,但王梓材(1792—1851)却把他当作郑伯熊(约 1127—1181)的弟子。他们都认为郑伯熊是与永嘉（靠近陈亮家乡浙江永康的一个有学术声望的地区）学派有渊源的资深学者，曾经师从程颐的弟子。所以，郑伯熊与朱熹有共同的师祖。朱熹从道学鼻祖程颐(1033—1107）那儿受益最多。一般说来，出自同一师门的学者即使重心不同，也有相同的学术倾向。王梓材注意到在一篇祭文中陈亮提及‘吾郑先生”因此,陈亮在郑氏之门而且属于程颐学派。⑩引用祭文来讨论陈亮的学术渊源表明确定陈亮师承证据不足；不过，王梓材及一些别的学者还指出了另外一些证据。例如,在《郑景望书说序》中,陈亮称赞郑伯熊解释文献的方式异于汉唐诸儒，不纠缠于文献的字面意义，而是把握了经典的微言大义。因此陈亮跟随郑伯熊的观点“纲理世变”“因时制宜”是经典的中心主题。⑪尽管《学案》的编辑者还提出别的学者作为陈亮的师承，并最终使他与程颐联系起来，但在郑伯熊的部分却着墨较多，谈论了许多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很难令人信服，这也暗示了陈亮与郑、程之间联系之脆弱。

中国对陈亮的兴趣经历许多世纪之后在近代得到明显深化。如，顾炎武(1613—1682)、颜元(1635—1704）以及一些别的清代(1644—1911）主张治术与实学的著名学者阅读并引用了陈亮的著

述。[12]在 19 世纪西方入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余波中，同治(1862—1874)中兴时期的许多学者都研究陈亮，而且翻印了他的作品。[13]当国内外矛盾愈演愈烈之时，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他们的文化传统，随后许多传统被他们抛弃。反传统的张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演化成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文化革命和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使陈亮第一次成为专题学术研究的主题。

学者们首先专心编纂年谱，这是陈亮研究的基础工作。年谱主要有 4 部,都作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力图描绘出陈亮的生活轨迹和著述顺序。不过，尽管这些编年叙述特意提供了许多细节，但早期文献中对陈亮学术渊源的主要争论仍未得到解决；而且,每部年谱都下过断论。例如,一个认为陈亮与程颐紧密相联,另一个则将他与 11 世纪反程颐的学派联系起来；第三个又声称说：“王通死,又五百岁而后陈亮生。始披发缨冠,为生民请命,世所谓跳踉叫呼，拥戈直上者也。……亮之死，世无人矣!’[14]在该时期研究陈亮的一部最有争议的著作中，何炳松力求推翻《宋元学案》的看法：他将陈亮与程颐联接起来，说明他们与“道学”之间并不相容。强调历史与实学的浙东学派是真正的儒学。并且，他声称，程颐与陈亮都对儒学发展作过主要的贡献。朱熹成功地用道教曲解儒家传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该在什么地方划分程朱思想中儒道的界限[15],当然何炳松除外。

萧公权认为，功利主义者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现实主义取向的复兴。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应及在新环境下对变革的适应使他们成为宋代具有创造力的政治哲学家。萧公权承认他们对儒学的自我认同，赞赏他们讥讽那些不务实际而故弄玄虚的知识分子——宋代理学家。他主张功利主义是儒学的一个方向,从而直接讨论了一些实质性问题而淡化找出陈亮师承的必要性。功利主义能在经典儒学的大师那里发现足够合理的根源，因此，没有必要将他们与在 20 世纪初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而崩溃的正统思

想——程朱学派连在一起。萧公权援引《宋元学案》来支持他的论点,认为叶适代表了功利思想的集大成。他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16]萧公权的著作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陈亮在中国政治思想中作用的最佳典范。[17]

吴春山对陈亮的深入研究也是将其放入经典儒学的广阔背景中,不过他称许陈亮(而非叶适)是南宋功利主义者中卓有创见的思想家。在经典儒家内部孟子(约前372—前289)与荀子(约前313—前238)的分歧问题上,吴春山发现并鉴定由荀子开端的传统,该传统在清代哲学家戴震(1723—1777)处得到最为系统的表述。因为人性恶的预设令人生厌(总的说来荀子是与之相联的),所以这一传统避免与荀子公开一致,但是陈亮和戴震的理论根本上仍源于荀子。荀子陶冶下的思想家拒绝承认孟子宣扬的人具有天生的道德性,他们无一例外地思考一种生理本性,它需要制约与磨练才能适应社会礼节规范。与"孟学"的唯心主义(基于直觉、道德意志及伦理知识)不同,"荀学"实在论者都是在直接感官经验基础上对世界取自然主义看法的唯物主义者。荀子的宋代后学很难找出理论基础来调和他们对功利的偏爱与同时代学者对道德修养的普遍关注。吴春山断言,陈亮为这一努力作了铺垫。而且,如果理解不了陈亮,恐怕就不可能搞清楚叶适是如何将宋代的功利主义倾向发展成一个学派的。《宋元学案》认为叶适重建了永嘉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它以陈亮的观念为基础。在这里,吴春山承认何格恩先前的论断:"叶适乃思想批评家而非思想家。其思想不出永嘉诸子、(吕)东莱、(陈)龙川范围之外,而态度则更为勇敢。"[18]叶适只是综合了吕祖谦对社会礼节规范的重视、永嘉的制度研究及陈亮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侯外庐将陈亮诠释为通常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功利主义者。他反对在陈亮身上作传统的学派划分,批评认为陈亮与程颐有着若干联系的观点,因为陈亮学无定师。其同时代学者如叶适就说陈亮的思想在当时是新颖的,通常被人视为异

端。陈亮虽然与叶适、吕祖谦相交甚密,但其思想却与二人不同,他们从未形成过一个流派。也许偶尔陈亮对客观标准只能来源于具体事物及历史情势有过犹豫;不过总的说来他一贯反对朱熹的唯心主义经验论。侯外庐指责朱熹认为世界是儒学信念的折射。作为一名现实入世者,陈亮反对朱熹对形而上思考的爱好、厌恶政治结果的偏见以及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复古努力。侯外庐强调了一些范畴,将几位中国思想家如王安石、陈亮放在包括西方思想在内的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不过,在 50 年代后期,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提及陈亮接近于法家思想——即古代中国寻求国家富强的现实政策。[19]

到了 70 年代初,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陈亮看作是法家更过于唯物主义者。在当时批儒运动的背景之下, 1974 年北京重印了陈亮文集作为法家的代表作。在未署名的前言中,作者称赞陈亮与朱熹的论辩,同 11 世纪王安石(1021—1086)变法一起是宋代儒法斗争的顶峰。陈亮特别将汉唐英主当作善政之榜样;因此,他接受历史发展与历史进化观而反对朱熹的复古思想。陈亮认为统治精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这有损其思想的进步性;而且,他的法家思想并不足以使他胆敢将锋芒直接指向孔孟。 1974 年陈亮文集的前言认为他最多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按现代通常标准来衡量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与侯外庐的评价不同。陈亮不能打破那些传统象征,如儒学之道,暴露出在本质上他仍属于唯心主义。[20]

1976 年以来的后毛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先前十年中的政治与学术。现在的学术趋向于反映实用主义的领导的意识,实用主义领导曾在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间统治中国的激进意识形态集团中被驱逐出去。正如当前经济、政治的政策是文革前方向的延续一样,对那些被承认的思想家的研究,如陈亮,也已回到传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范畴。在批儒运动中,政治压力导致将学者或政治家简单划分为两种:或是进步的法家或是倒退的儒家。这种观点

已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指责。从 1976 年开始,他们调整并重新评价了用来分析像陈亮这样思想家的法家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已经清楚，它最多只能附属于那些较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些范畴被侯外庐以及其他学者运用于中国哲学家的早期研究。[21] 简而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陈亮是功利主义者和入世者，但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却使他们将这两个特征置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标牌之下。

本书对陈亮的评价

本书力求矫正一些流行的看法。首先，尽管陈亮在某些方面与一些传统的思想派别有相类之处，但也不能简单地将他与任一学派牵连起来。例如，萧公权在陈亮与孟子间看到了相似点，而吴春山却将陈亮划归到荀子一路，与孟子思想直接对立。两个看法都不完全正确，但也并不全错。最好的办法是去研究孔子（前 551一前 479)思想中某些仍未解决的问题。孟子与荀子给这些问题带来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他们以不同方法来解决孔子学说中的含糊之处，并形成了对立思想或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但一般说来，任一儒者皆同时忠于两派——虽然他可能更倾向于其中一派。当儒学传统跨越新的时代与环境，得愈加复杂时，要将陈亮这种人放入任一传统阵营都越来越困难。陈亮思想体现出一些与孟、荀共同的主题，但它可以被看作——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从孔子而来。陈亮从不否认他对孔子的认同，甚至在殿试后，还写了一篇颂扬这位古代圣人的文章。虽然 20 世纪的学者怀疑持不同思想的传统中国学者自称对追随孔子之道的说法，但陈亮自我刻画的分量必须予以重视。当朱熹敦促陈亮成为‘醇儒’时,朱熹因意识形态以及分析性原因，为儒家思想与行为设置了严格的边界。尽管意识形态不断变化,但 20 世纪学者限定‘儒’范畴的努力却并不局限于分析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的。

其次，现代学术界对陈亮传承程颐说法的过分反应忽视了二程思想在 12 世纪更为宽泛的意义。如今学者一般都轻视王梓材在《宋元学案》中下的断语,即认为程颐通过弟子的传承影响了陈亮。的确几乎无人接受何炳松的论点，他说陈亮是程颐真正的学术继承人，朱熹却不是。本书承认陈亮与程颐间一定的渊源关系会被误解为同意王梓材、何炳松的观点。然而，从陈亮后 20 年及前 30 年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经历了一个自我与程颐紧密相联的阶段；而且，这一阶段对陈亮思想的发展来说非常关键。这不是在讨论传承的谱系，而是对陈亮生活转折期中某些思想与程颐间的深远渊源的断定。

这里的基本问题是二程思想在 12 世纪的实际涵义与他们在后来被显示的思想之间有区别。在 12 世纪的背景下，他们的思想广泛而无清晰界限。二程是颇具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接受每一位愿意就学的士子 因此,该学派复杂而多样,包含了 12 世纪初期与中叶几十年间不同的学术方向。大约 1170 年朱熹思想真正成熟后，他对二程弟子的批评越来越严厉。朱熹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综合(包括对二程思想的诠释)后来湮没了对立解释,后辈只看到 12 世纪程颐思想的狭小部分。12 世纪使用道学概念，其范围包括那些与二程有基本相同的伦理、学术观念的人。在 12 世纪 80.90 年代达到白热化的政治学术论争中，一些朝廷官员用这一术语攻击朱熹等许多学者，其中甚至包括像叶适这样与陈亮的倾向、思想相当近似的人。14 世纪纂修的《宋史》用‘道学’表彰经过严格甄选的程朱学派思想家。这一术语从此就在这个狭窄意义上使用。[20]本书对“道学”采取 12 世纪的广义用法，以求显示出浙江学者对程朱学派的关系及陈亮与程朱学派的分离。

第三，将陈亮等同于王安石的思路也有概念上的困难。二者相同是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这些学者包括从萧公权一直到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们合理地强调陈亮思想中功利主义与入世的方面，然而将两位宋代思想家划在一起就忽略了宋代政治文化研讨中陈亮本人的重要性。例如，陈亮根本反对宋朝的集权政治，他指责说集权大多归咎于王安石。他除了批评王安石外，与吕祖谦的通信也表明他与吕祖谦在某种程度上对王安石皆有敌意，这种敌意是从北宋主要保守主义者那儿继承过来的。在快到 40 岁时，陈亮转向功利主义，可以与王安石思想相比拟，而且他还降低了批评王安石的调子；但是将他与王放入一个范畴还是掩盖了陈亮学术发展的独立性。

认为陈亮与王安石取向相同反映了被一些学者夸大的前提，即认为所有入世者与功利主义者都是相同的，认为关注现实政治将他们纳入一个学派。虽然否认各种倾向的相似处可能是愚蠢的，但盯住共通点不放则会忽视一些基本问题。这种情况下，在宋代政治领域内,陈亮离‘ 右派 ’与王安石离‘ 左派 ’的距离几乎相等。陈亮的‘ 保守主义 ’部分出于他的抗金为首的观念。对于陈亮来说,这一观念经常支配着他在其它问题，如土地改革上的立场。王安石却相反，他对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关心远甚于关注外来威胁。他们思考问题的基点，尽管基于各自的现实情境，但也是根本对立的。作为经学家，王安石向古代经典寻找治国原则，而漠视任何有可能提出反对意见的历史先例。陈亮则强调将他的政治思想建立于研究历史变迁与历史情势上。按照定义，儒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关心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没有一个思想自觉的儒者会从原则上否认行动的重要性——尽管其个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无法行动。在儒者具有行动义务的共识下，讨论两个在其它方面明显不同的个人之间某些特殊联系恐怕会失去讨论的原来意旨。本书一个目的就是要表明对功利、结果的共同关心（但并不必相等）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优先性与价值观面前黯然失色的。

第四，现存研究的另一主要局限便是对陈亮思想成熟过程不

够注意。陈亮思想及其演变不能纳入近代学者分析框架的部分而基本上被当作特例被剔除。他们的理解太局限于陈亮的主要作品。例如，侯外庐认为陈亮间或提及天命是向唯心主义倒退。吴春山也低估了与陈亮思想相异的较为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及恩主对他影响的可能性。陈亮重印和编订的以往学者的著作只有一部还留存着[23],他的简短序跋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然而,作于后 20 年及前 30 年的那些序跋增强了陈亮作品中的传统性及道学特征。最为生动简洁地说明陈亮思想与那时的道学如何接近的是他作于 1173 年的一篇序文被收进了朱熹的文集。[24]该序是为研究道学三位鼻祖评论政治制度的书而写的。

陈亮与吕祖谦、朱熹广泛而公开的交往为他 20 多年的发展提供了里程碑。吕祖谦的影响比较温和，而与朱熹的讨论使陈亮将其思想发展中包含的一些激进成分表达出来。大约在吕祖谦去世前 4 年陈亮就越过道学,进入功利主义阶段,但他直到吕殁后的 1181 年才在著作中富有意义地发展了自己的新观点。吕祖谦是朱熹与陈亮二人最亲密的朋友，他的思想以一种较温和的平衡状态容纳了朱陈二人。由于没有吕祖谦作为缓冲，朱陈二人便因优先性及价值问题的尖锐分歧产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冲突甚至改变了朱熹对吕祖谦的评价，因为他认为陈亮表达的激进思想已经蕴含在吕祖谦的倾向之中。在 12 世纪 80 年代逐渐确定的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然而朱陈二人并未因关系紧张而绝交，他们仍然是朋友，继续进行思想交流。但侯外庐将他们作为敌对的双方。著名的清代文献学家、目录学家纪昀 (1724—1805)却把握住了他们的真正关系：尽管二人各行其志而有不少龃龉，但始终相互爱重。[25]至今,学者一般都将 1186 年陈亮致朱熹的现存最后的书信作为二人交往的终结，他们甚至认为陈亮与叶适不再试图与朱熹进行学术讨论。[26]朱熹后于 1186 年的几封信表明他们仍然维持有限的交流。批评带来的紧张与思想分化并没有完全破坏掉两人的关系。简

言之，所有的研究都未注重陈亮从道学向功利思想的转变及其道学阶段思想对他成熟倾向的影响。

新发现的陈亮著作的 1212 年版本与标准版本

以前对陈亮成熟思想及其与道学关系的理解不够，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后 20 年及前 30 年间的作品。传统使用的版本基于《龙川集》，包括本来的《龙川集》中近四分之三的著作。它是由陈亮的儿子编选的，并在 1204 一约 1214 年之间叶适为之作了序跋。《四部备要》标准本《龙川文集》印于 1927—1936 年间，共 30 卷。所有研究他的生平及思想的都以该版本或其它版本中的这 30 卷为基础。1974 年北京版《陈亮集》经过编者的搜集，补入一部分诗词 而且，通过比较以往版本的差异，编者校订了一些印刷错误。在该版本序言的结尾，作者只是提及叶适曾指出陈亮著述为 40 卷，而所有现存的版本只有 30 卷。[27]1981 年一位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收录了保存于 15 世纪前期编辑之《永乐大典》中的 5 篇颂文，作为 1974 年版本的补充。[28]除了 13 世纪初期叶适的序文外，13 世纪末年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龙川集》共 40卷，另外有 4卷补遗。《宋史·艺文志》也相信陈亮有 40 卷文集和 4 卷诗集。一部有 30 卷的 1616 年版本的序言声称陈亮某些原作现已佚失。将叶适跋文中的评论与现代标准本相比，便会注意到佚文包括 3 卷讨论《春秋》的文字 不过，其中很小一部分还保存在 13 世纪后期王应麟著的《困学纪闻》中。[29]简而言之，陈亮文集中约四分之一已经失传好几个世纪了。幸运的是，几年前，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珍本部发现了重要资料。这部 1212 年印制的书为我们提供了陈亮的另外作品，可能对理清其学术发展很有帮助。

本书的研究利用了这一珍本，其中包括一些陈亮写的从未被

人使用过的文章。1212 年，一位不知名的作坊主饶辉为这部木版印制的陈亮叶适的选集作序。该书共 41 卷,题名《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其中大部分资料在传统或现代的版本中也能找到。[30] 正像书名所标出的，饶辉的目的是为了圈点那些在文体上值得模仿的段落。二位学者作为文体学家和教师有相当的声誉；因此，饶辉明显期望这部圈点本能在那些想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寻到现成的市场。虽然传统版本收录了陈亮许多最重要的策问，但是饶辉本增加的策问超过 3 卷，这些都是陈亮在京师太学中作为领俸太学生所必需的常规考试。陈亮直到临终才高中状元，这些策问就作于从 26 岁到约 50 岁的各个时期。饶辉本还收录了 5 卷《汉论》,这部分文章题材多变，既包括对汉代君王的历史评判，又有对司马迁完成于约公元前 90 年的《史记》选文的解说。显然,陈亮是用它来教育弟子的。

如果运用得当“新发现”的 1212 年本可能为描绘陈亮思想演进之轨迹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正因为科举的性质，所以试图利用策问（及部分标明指导学生的文章）来讨论一个人的思想有其内在的困难，必须与考官保持一致所造成的现实或想象的压力几乎是一个普遍障碍，使人不能在考试的程式下自由发表意见。大多数中国专家都会认为科举考场上的高栅栏使考试环境特别紧严。仔细阅读陈亮的应试作品就会发现其中些许阴郁的色彩，以及他的叛道名声之所来。在这 3 卷作于太学期间的文章中，一部分谨慎而胆怯，而另一部分却大胆而直抒胸臆。这些自我表述的不同暗示陈亮特立独行性格之发展，这一点在他的另外文章中也能看出。总的说来,《汉论》的表达比较自由,因此更容易被用于讨论他思想成熟的演进过程。

确定这些文章的写作时期并将它们放入陈亮其它现存作品的集子中又出现一些难题。几乎不存在什么内在根据来确定应试作品的时期。在用他的另外作品作为材料证明其思想趋向定型的过

程时，这些策问可能与他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相联系。从他另外的作品可以推断《汉论》作于 1171—1175 年间。在 1170—1171 年间，陈亮每天要花很多工夫研究汉唐豪杰。随后，他开始教授私塾，并且,由于《汉论》是用作教学资料的,可能就写于这一时期。《汉论》的思想与作于 12 世纪 70 年代前 5 年的作品相一致。《汉论》在逻辑上也可能先于 1175 年分开出版的《三国纪年》。[31]

饶辉本有一个问题。就目前我们所知，仅存于饶辉本中的资料可能没有收入陈亮儿子编辑、叶适作序的选本；而且，中国古代权威的目录书也没有收录过饶辉本。可能有人要争辩说，叶适与陈亮的儿子没有收录太学时的策问及《汉论》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毫无意义。这种论点可能还会因饶本没有被现代的研究或主要的传统目录文献,如《宋史》、《文献通考》及 18 世纪的《四库全书》所收或所删书目提及而得到加强[32]，然而这一推断并不完全有说服力。关于认为叶适与陈亮之子有意识地删除了那些作品的观点，并不能说明这些资料未被收录，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确定原本《龙川集》佚文的一部分。尽管目录学家忽视饶辉本令人惊讶，但是这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佚失了好几个世纪，才被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收集者在本世纪寻找珍贵版本、著作时偶然发现也是可以想象的。 3 位资深的中国汉学家，杨联升教授、王德毅教授及洪业教授都曾研究过该书并且断定这些资料是陈亮原作，该版本是宋代的原刻。[33]

基于上面的论证，我相信这些资料应当作为补充材料用来探讨陈亮的思想发展。陈亮的思想从道学阶段向功利主义演进，并因功利主义的主张而闻名于世，其思想之激进有一个发展过程。为了理解这一过程，理解他与朱熹的论争，理解二者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义，首要的是必须注意文化背景——传统儒学的分化及其在 11、12 世纪的状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